

南朝鲜人民的志向

0731.2 / 119



2 028 4424 4

南朝鮮人民的志向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5

目 录

| | |
|---------|-------------|
| 南朝鲜现状 | 郑敬謨(1) |
| 韩国民众的志向 | 郑敬謨(12) |
| 泥泞之路 | T • K(34) |
| 可悲的证言 | T • K(65) |
| 抒情诗的时代 | T • K(96) |

南 朝 鲜 现 状

郑 敬 漠

一、韩国有过解放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当日本的统治告终的时候，韩国人曾陶醉于“解放”的喜悦之中，以为自己成了自由的人民。从那时起已经流逝了将近三十年岁月的今天，韩国人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荒原。

朝鲜总督府可能被消灭了。然而，“韩国总督府”却越来越显示自己的存在。

在迎接真正的解放之前，韩国人应当同自己本身展开什么样的搏斗，从什么状态中摆脱出来呢？

二、韩国是什么样的社会？

“正确的价值观”

闵宽植这个败类，是得了朴正熙政权的文教部长官的高级官衔的人物。他在访日旅行中，今年四月十二日访问了东京的韩国学校，在校务理事会上，作了一场离奇古怪

的演说。他说什么韩国妇女为了获取经济建设必不可缺的外汇，在国内外作出“献身”的努力，对此，作为文教部长官表示满意。他还极力赞扬说，特别是“韩国的妓女、女招待大批渡日，为国家出卖××日夜奋斗，其爱国至诚实为可嘉。”缺字的部分是连流氓在私谈中也难说得出口的话（韩国语）。然而闵宽植文教部长官却因这个使人难以相信的插曲，在旅日韩国人中间成了超级名人。

“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朴正熙总统喜欢说的话，他一有机会就反复说这句话。负有向国民宣传朴正熙政权所吹捧的“正确的价值观”的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文教部长官。真没想到，我们通过闵文教部长官的嘴，得到了“正确的价值观”的内容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具体解答。

加上，这些为了“卖××”而被派往日本的韩国妇女，从韩国政府那里得到名为“艺术使节团”的护照，而把证明她们确实是“艺术家”的证明书发给她们的正是闵宽植长官负责的文教部。

据最近一期的《时代》报道，持有韩国政府颁发的“允许在客人卧室安慰外国观光客”许可证的卖淫妇，仅在汉城就有一千五百人。韩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烟花巷。据说，通过这些卖淫妇得到的观光收入，一九七三年就将近一亿两千万美元。对于因国际收支的赤字伤透脑筋的韩国政府来说，卖淫业是必不可少的。上面的报道刊登在五月三十一日的《韩国日报》上，说是“全文翻译”。但是原文中说这种卖淫观光“得到朴正熙总统在内的韩国政府高级

官员的积极鼓励”这一段却被删掉了。这可能是因为用文字说出自己的总统是买卖卖淫妇的人贩子，未免太不好意思了吧！

大大欢迎公害

韩国妇女的肉体成了日本人排出生理排泄物的处所，同时，韩国的江河和海洋也正在急剧地变成日本企业处理废液的臭水坑。韩国的领土仅仅是十万平方公里，住着三千二百万人口。同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有一亿人口的日本相比，韩国并没有什么特别有利的条件可以忍受公害。韩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三位，日本是第四位。可见，公害容纳能力韩国倒比日本低。尽管如此，韩国政府却费尽心机地引进日本公害产业。

朴总统甚至指示“不必为公害神经过敏”。于是，石油、汽车、冶炼、电子、纤维以及娱乐业和旅馆业等各行各业的日本公害产业，认为这是大好时机，以一齐冲锋之势开始在韩国登陆。

今年头四个月，外国人对韩国的投资中，日本资本占百分之九十九。日本在绝对额方面也远远超过了美国。

目前，指控那些企图在韩国登陆的日本企业家抱有从经济上、军事上控制韩国的野心，也许是过分的。

在日本，找不到地皮，公害容纳限度也已超过，而且工资又高。因此，就算在韩国寻找其解决办法吧。然而，韩国政府却甘冒公害引进日本企业，其居心何在呢？朴政权是

不是把日本资本在韩国的“存在”当作维护权力所需的军事保证呢？朴总统在勉励为了把“通用马达”财阀引进韩国正在搞交涉的官僚的训话中说：“如美国大财阀进行巨额投资，就有和一个步兵师驻扎韩国一样的效果。”请读者把“美国大财阀”改为“日本资本”，“一个步兵师”改为“自卫队”后，再读一遍吧。

“没有日本的援助，就要垮台”

“联合国接纳中国，就将落为乡村信用组合一类的机构了。”因放这句厥词而被革职的是防卫厅长官西村。正是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外国记者俱乐部扬言：“为了救灾，自卫队可以向海外出兵。”“那么说，当东京受地震灾害时，日本打算要求韩国军出兵吗？”当在野党在国会上这样强烈质问西村长官时，他就用“这无非是个人的想法”一语，搪塞了自卫队海外出兵的问题。但是，西村的话真的就是西村本人的“想法”吗？同年九月，在东京举办韩日议员座谈会时，韩国派来三十二名的议员团参加。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国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前陆军总参谋长闵璣植在议员座谈会上的发言。闵某向佐藤首相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日本的援助，韩国就要垮台。望日本不要把韩国视为他国，要果断地予以军事援助。”西村长官的自卫队出兵海外的发言和闵璣植军事委员长要求军事援助，虽间隔两个月的时间，但认为他们两者之间没有什

么联系，那就太天真了。

增原防卫厅长官因公布天皇勉励自卫队“尽忠”的训辞而被革职。但在五月十一日，也就是在他落职的两星期前，美联社发出一则消息。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次官克雷·闵特，在那些应《时代》杂志的邀请访问华盛顿的“日本实业界寡头们”的面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1) 日本每年要向韩国提供一亿美元程度的军事援助；(2)要修改现行宪法，开拓自卫队海外出兵的道路。同时，韩国要求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的风闻也在不断地流传。

美联社的报道和天皇的话之间的一致，难道就是偶然的吗？六月十八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日本社会党收到有关日本对韩军事援助的秘密文件的消息，象是有意证明它并非偶然。据报道，这个以“关于日本防卫政策”为题的秘密文件的内容是：日本向韩国提供外表上不能认作军事器材（卡车、通讯器材等）的东西，韩国就从这里得到财政上的余力，增加军费开支。这对朴政权来说，无疑是一条减轻他头痛的好消息了。

五千亿圆的所有者

韩国同北朝鲜相比，拥有二倍多的人口和居世界第四位的庞大陆军。据他们说经济发展也非常炫目，歌颂着繁荣。那么朴政权何以怕得一味投靠日本的军事力量呢？我们可以用各种事实说明这种理由，但是，让我们探讨一下政府怀疑国民和军队忠诚的根据之一——极端的偏富。

据韩国政府发表的资料，年收入不满九万六千圆（每月收入八千圆）的达一百四十万户，占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如果把每户人口按五名计算，每人的一年收入为一万九千二百圆，按现在的兑换比例（一美元等于四百圆）计算，仅等于五十美元以下。今天，日本的每人平均一年收入为三千美元以上，而在韩国约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人却过着一年不足五十美元的生活。据公布，全国饥饿儿童达一百二十万名，占全国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但在实际上要比发表的数字更为严重。报纸说，在汉城中心常常发生这种事件：在学校买不起午饭的穷家饥饿儿童，成群结队地向买午饭吃的孩子们施加集体暴行。

与此相反，南朝鲜还存在着超出人们想象的富裕阶层。据说，这里有四个人，他们不是企业家，是有权有势的官僚。他们的私有财产竟超过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额的百分之五十。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因为私有财产达三百亿圆以上，曾经在国会上受到追究（一九七〇年）。那时，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额是一千八百亿圆。韩国政府的要人们怕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对北朝鲜怕得要命呢？这是不需要我来解答的。

建立在贫穷之上的政权

据汉城大学（医学院）所做的调查（一九六七年），汉城市居民户主的百分之三十二是失业者。

韩国政府采取的抵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归根结底，就

是降低农产品价格。

在韩国，政府支付的大米收购价格，没有一次超过农民的生产费。这样一来，农民无法生活，弃农离乡，涌向城市。一九六〇年，汉城市的人口为二百五十万，到一九七二年竟突破了六百万。

一九七〇年一月，韩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

弃农的农民的增多和城市失业者的剧增，对朴政权来说，虽然是个伤透脑筋的问题，但是也有对朴政权有利的一面。

朴政权的经济政策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是，增加出口，引进外国资本。朴政权正是把外国资本的“存在”，看做是对他们的军事保护的保证。他们把低工资作为增加出口和引进外国资本的决定性手段。城市里聚集着无数的产业后备军，他们身在工资再低也不敢说一句怨言的处境，这对朴政权是十分有利的。

汉城延世大学的聘请教授杰·普莱顿斯坦说，听任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朴政权的有目的的政策。

不堪忍受的困苦生活，叫人无暇过问政治；叫人提心吊胆，唯恐丢了官职落到最贫穷的境地去，这也不是不利于朴政权的稳定的。

把国民的贫穷当作维持政权的“群众基础”，是朴政权的存在的一个特点。

远大的设想

戴高乐在法国国民中所以能够起到教祖一样的领导作用，一句话，可能是因为他在民族受难的时期进行了反对纳粹的抵抗运动。他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所以这一功劳对法国国民来说，也是一件不能忘记的事情。

然而今天，朴正熙总统却自称自己是韩国的戴高乐，并且把“十月维新”同法国的第五共和国相提并论。看来，朴正熙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纳粹”的走狗，忘记了自己参与美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夺去了一万多名青年的生命。戴高乐修改法国宪法的目的，在于加强总统的权力，是事实。但是，他向国民公布了宪法的内容，使他们深入地进行了讨论，充分地提出了反对意见，然后才修改了宪法，并且通过国民投票检查了对自己的信任。在国民投票中如果失败，戴高乐是准备把政权交出来的。但是朴正熙的情况则不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直到距离对修改宪法举行国民投票的日子只有两周时间的时候，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几乎没有一个韩国人清楚地了解新宪法的条款”，尤其是对新宪法论是非是严加禁止的，并且威胁人们如果违反这一禁令就处以严重禁闭处分。

在进行国民投票之前，朴正熙威胁说，如果改宪被否决，就将这看作是国民不希望南北统一的证据，“将采取别的方法”。

“别的方法”是什么，并不清楚，但是即使在国民投票中失败也不打算放弃权力，这一点是清楚的。

朴正熙把自己比做戴高乐，但是为戴高乐的名誉着想，这恐怕是不公平的。韩国人并不那么无知，以至不知道这是不公平的。

于是，朴正熙迫切需要孤注一掷，想出什么妙方来收买人心。

这就是据说将在一九八一年实现的每人平均产值一千美元的设想。但这不过是用数字愚弄国民的骗局。为了粉饰这个骗局而必不可少的，就是日本的经济援助。

假如，骗局被揭穿，民众的反抗达到不可抗拒的地步，朴正熙准备依靠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日本的军事干预。朴正熙一直期望日本为了保护对韩国的投资所获得的“权益”而进入韩国。

据说，一九七三年六月，金钟泌访日的时候，向田中首相提出要求，为了发展韩国的重化学工业，请求日本投资总共达五百亿美元。

五百亿美元，这是超过韩国目前国民总产值五倍的巨款。

当这笔巨款实际投入韩国的时候，韩国能不能作为韩国而存在呢？

不过，投资越大，对朴政权就越有利。

军事干预的确切性也与之成正比例，愈益增大。

六月二十三日，朴正熙抛出“两个朝鲜”的路线，开始走上了固定分裂的道路。

他打的算盘是要引进日本的力量，使之充塞韩国，以阻挠统一。事实上，它追求的是“一个朝鲜、一个日本”。

《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发表了以《韩国对重工业的向往和日韩合作》为题的社论。社论提出警告说，日本对韩国的援助和投资，“是对特定阶级的帮助，将招致加剧贫富之差距的”结果，因此，必须慎重对待。

这篇社论的论调，没有不对头的。我想，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是遗漏了？

朴正熙认为日本的投资是对自己政权的军事保证，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最近急剧增多的资料证明这一判断是没错的。

三、日本变了吗？

今年六月十二日在东京召开的韩日议员座谈会上，田中首相说：

“日本同韩国是一衣带水的关系，衷心希望韩国安定和繁荣。虽然会有种种困难，但恳切地希望南北对话成功，实现自主统一。”

但是，我们从今天的日本政府的政策中，找不到什么证据足以使我们相信日本现在希望朝鲜半岛的统一。过去当中国人呻吟在被分裂的悲剧中的时候，日本的政策是助长分裂、固定分割。日本曾经宣称要为中国的统一助一臂

之力，并斡旋“上海南北和平会议”（一九一九年二月），但是在背后实际做的是另一套，同已经变成傀儡的军阀政权签订了秘密军事协定（日华共同防敌协定，一九一八年五月）。不言而喻，日本说是“为了对付危害远东全局的和平与安全”的这一军事协定，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从这一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这难道是欠妥的吗？我们很难找出什么证据使我们充分相信今天日本的政策不是“南北两朝鲜之间的争斗，不仅无害于我们，而且我们应该努力乘机获取我们的利益”。

（摘自日本杂志《世界》一九七三年第九期）

韩国民众的志向

郑 敬 谟

一、来自北方的威胁

继大平之后，木村俊夫于七月十六日（一九七四年）深夜，就任外务相的职位。而第二天就有前韩国“国务总理”白斗镇等人物急急忙忙前去祝贺新上任的外务相。

据报刊（《读卖新闻》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八日）报道，木村外务相对金大中问题表示不满意，说韩国方面“如不认真考虑是不行的”。而前任国务总理白斗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倒很奥妙，他说，“因为日本国内对这个问题过于大叫大嚷，所以反而成了个棘手的问题。对他的袒护，却招致了不利于本人的结果。”

如果，日本国内没有“大叫大嚷”，那末，身被捆绑在重物拉到绑架船甲板上来的金大中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韩国政府“劝告”说，“要是大叫大嚷就不会有什么好处”，于是日本政府在早川、太刀川这两个人的问题上保持了沉默，结果碰到了什么问题呢，对这些问题不想多谈了。

可是，日本向韩国要求解决金大中的问题，决不会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为“袒护”金大中这个人的。我想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不行的。我认为，日本所以提出这个问

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同合法地侨居在本国的所有外国人的人权和被韩国侵犯的本国主权的根本原则有关。

对这一事态，如果不了解所发生的问题的本质，而毫无根据地只把问题看作对特定人物的“袒护”，那么说朴正熙及其派系的人物对日本的真实要求，乃是意味着对朴正熙他个人的“袒护”喽。

凡是韩国人，虽然不敢公开地说，但对于同朴政权有关系的人的这种卑鄙的思考方式和对日本的无止境“献媚”的丑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恶心。且说，据报纸(同上报)报道：白斗镇向木村外务相“举具体实例说明北朝鲜的威胁，并强调了进一步加强日韩友谊的必要性。”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的“具体例子”可能是指最近(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东海发生的击沉韩国警备艇863号事件说的。

但是，据同上的报道，白斗镇和木村外务相的交谈时间总共只有“二十五分钟”。而在这短暂的时间内，白斗镇怎能把事件的真相“具体地”讲给木村外务相听呢？这是令人怀疑的。我对白斗镇的说明做一下补充，想就在韩国国内象我这样被剥夺了发言自由的韩国人怎样理解“来自北方的威胁”，并且如何对待最近作它的根据的“警备艇事件”做个说明。制造两个日本人参与的民青学联事件并把这个事件的嫌疑犯大量判处了死刑，对此他们终究也是用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这个名堂来使其正当化的。日本读者必须认清这一点。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韩国警备艇863号被北方的海军击沉，是南北双方都承认的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是，这艘

警备艇被击沉之前，在哪个地点，做了什么，这一点只根据韩国方面公布的资料是根本无法了解它的真相的。而且这艘警备艇不是属于美国指挥下的韩国海军，而是属于韩国内务部的，美国方面似乎也没有掌握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因此北方是否在南朝鲜领海进行过侵犯行为和“威胁”，只分析韩国报刊上的文章是无法弄清其真相的。

据《东亚日报》（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报道，韩国国防部公布：警备艇863号被击沉的位置是“军事分界线以北三至五海里的海面”。

但是这艘警备艇并不是起初就在分界线以北的海上，“而是遭到企图截获并带走它的北方警备艇的攻击后，进行交战，激战后被迫赶进分界线以北”而被击沉的。

那么说，这艘警备艇的原来的位置呢？据国防部公布，它原来是在巨津以东二十五海里，军事分界线以南九海里的海上。也就是说在韩国的领海上。

每当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韩国方面发表的和北方发表的通常是有差异的。但是据朝鲜通讯社在报道（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平壤广播电台播音时说，在战斗开始当时，韩国警备艇的位置是在“水原端以东十一点三海里，军事分界线以北六点二海里”的海上，是北方的领海。

既然没有目睹现场，只凭双方的公布，是无法判断哪一方的主张正确。但我是韩国人，可能是引水先到自家田的心理作祟，很想相信本国的公布，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有时也疑惑强词夺理的兴许是北方？

但是，七月一日国防部长官徐钟喆出席国会的国防委